

追梦的复旦人

用创新的方式服务社会



刘松波：管理学院2016级本科生，2018—2019学年本科生优秀学生标兵，获得国家奖学金、第四届“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金奖。

“创新”是刘松波经历中的关键词，影响着他的选择，他的探索，也让他在不同的阶段，对这个词的含义形成不同的理解。

“创新”的最初来自于尝试。初入复旦的刘松波就读于自然科学实验班，但全新的环境给了他难以调整的不适感，不同的学习方式、独立的人生选择、几乎无约束的生活让他一时间找不到和学习、生活相契合的点。“转专业”是他的一个重要决定。来到了憧憬已久的管理学院，他如鱼得水，获得了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等。在管理学院，他向周围更优秀的同学看齐，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激励着他开始多方面的“尝试”；在学校，他担任唐跃军副教授的研究助理，关注“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在实践中，

他在中信证券研究所，尝试以成熟的美国钢铁业为对标，研究并购重组对钢铁业的效用；在海通新能源基金，研究“机构解禁事件对公司股价的影响”，独立负责量化项目……

刘松波欣喜地发现，这些都是他一直热衷的东西——“透过事物表面，探索内在动因”。而逐步进入“创新创业”的领域，在校团委青年创新中心任活动科室负责人，这一经历让他接触到大量创业项目，感受到“创新”另一面的魅力所在。刘松波发现，很多团队的想法和他们的核心能力不匹配，市场分析不到位、对投资人需要什么、竞争对手有多少都不够了解，这让他们的定位模糊甚至偏离了竞争优势。这些积累让他发现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所面临

的问题。而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则给了一个实践的机会，他全程跟进项目，对项目的专利归属、底层实验室、产品技术渐渐有了详细的了解，而非仓促地、表面地去做商业路演；他脚踏实地地参与一场场淘汰赛，敏锐地捕捉投资人和评委的需求，在团队的努力下，项目获得了全国金奖。创赛之后，刘松波还辅导过一些创业队伍，帮助他们找到项目和市场能够对接的“新”之处，从“客户是谁”入手，调整产品逻辑和商业模式。

但“创新”究竟是什么？刘松波仍在思考。当他看过一个又一个失败的创业例子后，“透过事物表面，探索内在动因”这句话又重回脑海：“是否其中还有更深刻的逻辑呢？”国际化的视野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刘松波的思维，在纽约大学，他掌握了很多关于创新的工具，包括“问题框架树”、“问题递进层级与关联图”等；在哥本哈根大学，他接触到了“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概念，看到展示团队使用肉用畜类的皮毛制作漂亮衣服，改变垃圾桶的形状来避免其被风吹翻……他被丹麦人创业时的执着理念所震动，那种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在他脑海中开始清晰；在联合国支持的 UNLEASH 全球青年创新集训营峰会上，当

他听到不同国家的有志青年发表对留守儿童和女性教育权利的创新方案时，当他接触到那些为了追求社会价值不懈努力的独立女性时，他终于了解了创新的奥义——创新从问题出发，或改变或颠覆，它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它是自我价值在社会层面的灵光闪现。这一理解，让刘松波恍然大悟：他找到了创新的基点，这也是他今后不断奋斗的出发点。

在“创新”路上，刘松波砥砺前行：“用创新的方式，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是他最大的梦想。回首四年半的本科经历，他坦言，变化最大的是性格，他是个有棱角的男孩，曾因不太成熟摔过跟头，但这些都成为他经历里弥足珍贵的一部分。他热爱学校自由的环境：“让我主动选择、思考，去承担自己试错的风险和责任，而不是被动地推着前进。”自由培育了他的辩证思维能力和正义感，他在不同的平台代表中国的青年人发声，也接触到不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的人。“和他们对话、讨论甚至是辩论，让我学会尊重多元的价值观，也扩大了自己的世界观”；竞争的压力让他在自省过程中完善自我，从课堂到实践，从校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际，每一步都坚实而庄重，都迈向更广阔的天地，迈向更远的思想！文 / 项天鸽

【一线来稿】

我的初心：扣好第一粒扣子

钱冬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年我不满17岁，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快到87周岁。70年中，我最难忘的记忆是确立自己的信仰。

习近平同志多次反复强调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我跨出扣好第一粒扣子的第一步，启蒙的一步。

我老家在无锡县的一个小镇，当时叫杨墅园（现杨市镇）。我父亲在镇上开一家小杂货铺营生。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日寇铁蹄恐惧之中度过的。抗战时期，苏南是日伪敌占区，但也是新四军游击区，我的堂兄就是新四军锡西办事处副主任。我7岁上学，在私立匡村中学及其附小读小学至初二上学期。1946年寒假后去无锡县立中学（解放后的无锡一中）读书。那是抗战胜利不久，然而，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快速增长。无锡是“四大米市”之一，运河边上米店聚集。国民党的法币迅速贬值，物价飞涨。穷人买不起米，多次发生哄抢米店事件。无锡县中不收钞票了，开学时我父亲送我上小船，给我带大半麻袋米，到学校过秤交学费、膳食费、宿费。

1948年暑假后到上海复兴

中学读高中，那时我家已经衰败，交不起学费了，是我二哥供我继续读完高中。

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生活的旧社会，虽然还不懂事，但我对它的直觉是一个腐朽的、没落的社会。

1949年5月，上海刚刚解放。有一天我在横浜桥上海戏剧学校校园和一群人一起围着看李波唱《翻身道情》，对解放区有了最早的一点感受。还有在横浜桥永安电影院看了话剧《刘胡兰》，年青女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使我十分感动。

刚解放的上海，物价在上涨，银元（“袁大头”、“孙小头”）成了硬通货。街头到处是银元贩子。四川北路底一些银元贩子手插在裤兜里，抖动银元咣咣作响，吸引买家。上海市军管会发动打击银元投机运动，很快物价稳定下来了。我对共产党生起敬仰之心。后来我懂了，才知道那是在党领导下上海打了一场经济战的结果。

我们中学生本来就看不上上海滩的流行歌曲，解放后风气变了，同学们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国际歌》，在毕业典礼上，我们上台合唱《保卫黄河》。

最难忘的是庆祝中国人民共

和国诞生的大游行。由于9月底台风在上海登陆，南京路全是积水，大游行在10月8日举行。大会场设在跑马厅（今人民公园）。同学们一早集合出发，一路高呼口号，从四川北路底步行到会场，聆听首长讲话，观看表演。那时设备很差，讲话是听不清的，观看表演只是远望而已。但大家非常兴奋，散会后回到家已是半夜。

复兴中学教导主任陆善涛老师讲“社会发展史”，使我知道了阶级这个概念，知道了人是猴子变来的；不是地主养活农民，是农民养活地主。2000年上海市教卫党委叫我做“三讲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巡视组长，我到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在走廊里一眼认出了他，我说：“陆老师，你可能忘了，你是在复兴中学的启蒙老师。”原来他离开复兴中学后，最后是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所）所长职位退休的。

从我居住的山阴路四达里到复兴中学上课，经过坐落在山阴路上的一家书店，是知名的“内山书店”旧址。我在这家书店买了两本书：毛

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我最早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实当时我没有读懂，但觉得非常新鲜，知道了许多新的概念、词语，感到书中讲的是真理。

启蒙教育使我自然而然地有了追求进步的政治倾向，对当时上海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政治谣言反感，而且在班级小组学习会上讲出来。

1949年10月下旬，复兴中学领导告诉我和班上另一位同学张永亨（他的哥哥是地下党员）做我们高三乙班的建团筹备委员，负责介绍同学入团；我就这样没有经过申请和审批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从上海解放到高中毕业，我受到革命启蒙教育，虽然还很幼稚，但扣好了第一粒扣子，成为一个进步青年。在1950年8月，大约是23日，一些同学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送我上火车时，谢锦昌同学让我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我写了这样一句话：“跟着毛泽东，建设新中国”，应该是我的初心。

回首70年，我没有违背这个初心。

我与祖国 共成长

复旦最新出版

蛾术轩藏书题跋真迹

《蛾术轩藏书题跋真迹》（线装本）主编：王欣夫

蛾术轩系近代文献学大家、复旦大学中文系王大隆先生（1901—1966）晚年所用书斋名。先生字欣夫，号补安，中年后以字行，室名学礼斋、抱蜀庐、管窥居、蛾术轩等，江苏吴县人。先生又为著名藏书家，尤以勤于钞书校书著称。兹选印蛾术轩藏书题跋真迹百种，以纪念先生逝世将届五十年，而尝鼎一脔，亦可借窥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蛾术轩遗书之秘。

先生长于文献之邦，继承吴中朴学传统，身处二十世纪社会文化转型之期，其治学旨趣，以传统学术为珍域，由经学小学入门，泛濫于史百家，通晓学术源流，谙熟古今著述，嗜学好书，穷年矻矻，毕生以保存并流播稀见文献为职志。先生所钞校编藏者，莫不关乎前贤遗著之流传聚散。

复旦图书馆所存蛾术轩遗书，含诸家稿钞、批校、题跋本千余种，皆先生历年披沙拣金、锐意搜讨所得，或经传钞借校、辑佚过录而成，其中稀见秘籍及未刊著述，不仅皆复旦大学藏书之精华，亦为民族文化典籍之瑰宝。

先生以一书生之力，用柔克刚，守先待后，虽历经劫难，仍成就卓著，其志趣学养，至今令人景仰不置。

先生晚年撰《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著录所藏稿钞校本近千种，提要钩玄，体例精严，藏书精粹，悉发其蕴，洞见卓识，世所推重，书经刊布，享誉士林。先生藏书题跋之真迹，则多亲书于封首卷尾，或溯学术源流，或商著作得失，长短不拘，繁简随宜，所述与《书录》异曲而同工，相辅以相成。间涉人事，多存掌故，随文抒感，具见性情。先生治学，恪守清初三惠以下考据学派之传统，其藏书则秉承清代学者重版本、勤校勘之遗风。

诵其题跋，观其法书，想见其为人，沾溉其精神，信为艺苑之珍珠，后学之津梁。题跋搜采，遗珠待拾，本编辑真迹，悉依年月编次，并录文于后，庶以见先生为学藏书之轨范。